

《孟子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

杨海文

国学大师钱穆晚年至少两次罗列过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书目,第一份包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六祖坛经》《近思录》《传习录》(参见钱穆:《新亚遗箴·读书与做人——香港调景岭慕德中学演讲词》),第二份包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六祖坛经》《近思录》《传习录》(参见钱穆:《中国文化丛谈·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》)。这两份书目都有《孟子》,《孟子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那么,《孟子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?

一、“道性善”

《孟子》全书凡七篇,依次为《梁惠王》《公孙丑》《滕文公》《离娄》《万章》《告子》《尽心》。就字数论,全书白文计3.5万余字,若计入标点符号,则增至4.6万字。从外在的体量看,《孟子》是一本书;从内在的精神看,《孟子》是一本大书。南宋施德操曾说:“然私窃论之,孟子有大功四:道性善,一也;明浩然之气,二也;辟杨、墨,三也;黜五霸而尊三王,四也。是四者,发孔氏之所未谈,述《六经》之所不载,遏邪说于横流,启人心于方惑。”

先秦时期,许多人谈论人性,但唯有孟子以性为善。所以,孟子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就是“道性善”,其不同于且高于同时代

思想家的地方正在于此。北宋程颐谓:“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,以能明性也。”(程颢、程颐: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八)南宋叶适言:“以性为善,自孟子始。”(叶适: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一四)元代胡炳文云:“性善之论,自孟子始发之。”(胡炳文:《孟子通》卷五)明代顾宪成说:“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万世,是提出一个‘性’字;其所以阐明这性,是点出一个‘善’字。”(顾宪成:《小心斋札记》卷一八)这些后世的思想家都道出了孟子对于性善论的首创之功。

从本体论看,性善论是孟子的独创,心性是孟子的特色。朱熹言:“孟子发明四端,乃孔子所未发。”(黎靖德:《朱子语类》卷五

三)牟宗三说:“孟子是心性之学的正宗。”(牟宗三: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)孟子因发明四心,成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正宗与主流。“心”和“性”是孟子阐发其思想的关键。不论“性”,孟子在哲学上走不进他的那个时代;不谈“心”,孟子在哲学上走不出他的那个时代。“道性善”的“道”也有论证的意思,它涉及孟子即心言性、以心善言性善的论证方式。人人皆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(恭敬)之心、是非之心,这“四心”分别对应着仁、义、礼、智。孟子笔下的“性”是指仁、义、礼、智;孟子心中的“性善”是说人心善足以证明人性善。由此,“心”和“性”也成为理解孟子思想的锁钥。

二、“明浩然之气”

作为孟子的理论创新,“浩然之气”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堪称最大的难点。明代高攀龙言:“从古圣人未曾说气,至孟子始说浩然之气,始说夜气,最为吃紧。”(高攀龙:《四书讲义·“牛山之木”章》)冯友兰说:“‘浩然之气’是孟子独创的名词。到后来,孟子的影响日益增大,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,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。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,连孟子也承认‘难言也’。”(冯友兰:《中国哲学简史》)清代方以智讲:“孟子征端于情,表体于才,痛人之从小体而失其

良也,又虑人之守冥漠而二概也,辟天荒创为养气、践形之说。”(方以智:《东西均·三征》)由此可知,“浩然之气”就是道德之气、道德境界。

“明浩然之气”的“明”字旨在阐明孟子为什么自称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。胡炳文曾说:“《孟子》一书,三‘养’字皆切要语:曰‘养气’,曰‘养性’,曰‘养心’。合而观之,气生于理,善养气者在养性;理具于心,善养性者在养心;心汨于欲,善养心者在寡欲。寡之又寡,以至于无,则心存而性存,

气不必言矣。”(胡炳文:《孟子通》卷十四)从工夫论的角度看,寡欲是养心的前提,养心是养性的基础,养性则是养气的关键。因此,“浩然之气”的养成就与人欲横流形成鲜明对立,养“浩然之气”的过程就与存心养性的工夫互为表里、相辅相成。具体而言,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是“浩然之气”的鲜明体现,而“仁且智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的理想人格则是养“浩然之气”的终极关怀。

三、“距杨墨”

孟子一生以“距杨墨”为己任,并且将此重任与“禹抑洪水而天下平,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,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的功业相提并论。在孟子看来,杨朱主张“为我”,其实是“无君”,亦即不要国家;墨翟主张“兼爱”,其实是“无父”,亦即不要家庭。如果对这两种思想听之任之,就可能导致人类重新回到“无父无君”的禽兽状态。因此,孟子提出了“五伦”的伦理道德观,即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(《孟子·滕文公

上》),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,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,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,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,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。孟子通过“五伦”这一套伦理规范社会行为,调节社会关系,维护社会秩序,为人类文明指明出路。

欧阳修曾说:“昔战国之时,杨、墨交乱,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,故仁义之说胜,则杨、墨之学废。”(欧阳修:《居士集》卷十七)肯定了孟子辟杨墨、扬儒学的巨大功绩。朱熹言:“辟杨、墨,是捍边境之功;发明四端,是安社稷之功。”(黎靖德: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三)朱

子认为,抵御异端就是恪守仁义,所以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,坚守仁义之道犹如安定社稷,拒斥杨墨之道犹如保卫边境。对孟子“距杨墨”的历史功绩,苏轼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使杨、墨得志于天下,其祸岂减于申、韩哉!由此言之,虽以孟子配禹可也。”(苏轼:《苏轼文集》卷十)在苏轼看来,如果放任杨、墨两家思想恣意传播,其对社会伦理的戕害不亚于以申、韩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人伦纲常的毒害。以此而论,孟子的“距杨墨”之功可与大禹治水的功业相提并论。

四、“黜五霸而尊三王”

《孟子·告子下》有言:“五霸者,三王之罪人也;今之诸侯,五霸之罪人也;今之大夫,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”明代薛瑄曾说:“孟子深辨王霸之诚伪,所以扩天理、遏人欲也。”(薛瑄:《读书续录》卷五)近代学者唐文治亦言:“辨王霸,是孟子一生大学问。”(唐文治:《孟子大义》卷三)纵观历史,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,究其实质,皆行霸道;三代之治、周孔之教,究其根本,皆行王道。孟子秉持尊王贱霸的社会历史观,并非泛泛而谈,而是将虚功实做,立足实际,以民为本,将民生问题摆在首位。

王道的本质是“以义为治”,以仁政、民生为核心。欧阳修言:“孔子之后,惟孟轲最知道,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,畜鸡豚,以

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。”(欧阳修:《居士外集》卷十七)清代张英云:“孟子以王佐之才,说齐宣、梁惠,议论阔大,志趣高远,然言病虽多端,用药止一味:曰‘有恒产者有恒心’而已,曰‘五亩之宅’‘百亩之田’而已,曰‘富岁子弟多赖’而已,重见叠出。一部《孟子》实落处不过此数条,而终之曰‘诸侯之宝三:土地、人民、政事’。”(张英:《笥素堂文集》卷十四)现代学者金耀基亦云:“中国人论政,真正自民之观点发挥张扬者,三代以还,以孟子为第一。”(金耀基:《中国民本思想史》)上述这些表述皆是就孟子的民本思想而论。在孟子看来,王道与仁政、民生三位一体:推行仁政就是践行王道,而仁政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。霸道的本质是“以利为

驱”,以武力、强权为手段,实现利的现实诉求。孟子尊王贱霸,认为只要行仁政、保民生,霸道便不攻自破。清代孙奇逢说:“言利者得害,言仁义者得利,此千古不易之理。”(孙奇逢:《四书近指》卷十四)王霸之辨的根本就在于义利之辨,这也是孟子和盘托出的千古不易之理。

综上所述,孟子为中华文明立下的四大规矩涉及本体论、工夫论、伦理道德观、社会历史观,内容全面,思想深邃。《孟子》一书,既有飞扬灵动的文采,可以当作文学作品品读;又有翔实可信的史事,可以当作历史文献研读;更蕴含精微深刻的义理,故而古往今来多被奉为哲学经典。

据孔子研究院公众号